

1991 JUN 25

JUN 25 1991

UNISA COLLECTION

秘 书 长

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

大 会

正式记录：第四十五届会议

补编第 1 号 (A/45/1)



联 合 国

秘 书 长

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

大 会

正式记录：第四十五届会议

补编第 1 号 (A/45/1)



联 合 国

1991 年，纽约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

一

我们进入了一个两面性的时代。一面是希望，另一面是危险的放纵行为。在世局发展的一个主要方面，我们目睹了巨大惊人的政治变革。但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情况依然暗潮汹涌、暴力倾轧，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极不稳定的和平状态。1989-1990两年期各种比较有利的发展会不会给整个世界局势带来良好的影响，这个问题还是没有答案。

冷战的结束意味着抛弃许多种假设；这些假设曾经阻挠国际事务的进展，长期滋生猜忌和恐惧，使世界两极分化。就社会思想和实际政策的目标而言，冷战结束的教训是多方面的。但从联合国的观点看，三个特点具有全球性意义。

第一，东欧和中欧的革命性发展有力地体现了《联合国宪章》的两项主要原则：人民的自决和对人权的尊重。

第二，情况强有力地显示：以军事因素为主要基础的现状一定极不稳固。

第三，目前开始出现的一种范围更广、更合情理的安全概念，包括它所涉及的各个方面，正是联合国多年来阐扬的一个概念。联合国向来有一个不变的主题：迷信军事安全造成军备竞赛的自我延续、颠倒事情的轻重缓急、阻碍社会和经济的进展、抑制政治对话、影响国家的体制，使其受到长期的损害，并加深所有国家的不安全感。这个过去往往无人理会的呼声，现在变得空前的响亮高昂。

因此，这种变化使得整个冷战结构变成过时落伍，也使得联合国所要执行的和平蓝图重新显现。无论是欧洲发生的建设性改造，或是其它地区大爆发的

破坏性趋势，都不需要修改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原则和宗旨。事实上，在这方面，政治演变逐步扩大并澄清《宪章》原则的范围，《宪章》也随之增添更丰富的意义。

因此，联合国进入冷战后的时代，成为变化无常世局中的一个不变的中心点。联合国经过多年的耐心工作，终于使它所属各机构的机能具备一种互相配合的功用，因此，它远比以前更适合履行其艰巨的任务。安全理事会以《宪章》所设想的方式行使权力，大会和安理会在工作上多次相互支持，安理会全体成员与秘书长之间的密切合作，秘书长所代表的秘书处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负起日益繁复的和平任务，以及目前设想重振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作用等等，都证明联合国所属各机构的能力正在加强。

随着联合国能力的提高，变革的潮流又突出了它的重要性，联合国的使命因而有了三大目标。联合国必须努力消灭全球各地区战争的种子，并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正视一个事实：在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出现新的冲突根源。联合国必须作为一个主要工具，把合作的精神推广到两个领域——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人类各种社会问题——这些领域看似无关政治，却有深远的政治影响。联合国必须努力不懈地确保国际事务以法治和普遍尊重人权为依据。

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任务，但也是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对我们的起码要求。

二

纵览当前政局，我们看见欧洲已出现新时代的曙光，有些地区光明乍现，而其他地区则仍覆盖着旧仇与新恨的黑云。

两个德国的统一和东欧的变化标志着二次大战以来欧洲长久分裂的痛苦局面终结。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欧洲的政治情势产生了剧变，这整个过程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是，所有有关各方，包括世界大国，都表现了高度的谅解、远见和对民意的尊重。没有其他情况更能反映出这些大国之间的关系有根本的改变，预示世界历史将开始一个更富有建设性的新篇章。值得注目的是，在另外一个区域，两个也门国家决定在这一年和平统一，成为新的也门共和国。

事实上，在这明显可见的新态度和新观念蔚成的气氛中，人们更加期待当前遍及欧洲的开放程度和欧洲所作的和平选择也能出现在世界其他各地。但是，类似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最近事态发展提醒我们，低估世界政治紧张局势是危险的，而且其他大陆目前的紧张局势背后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因素。只有全世界都能够以和平手段作为解决争端的恒常途径，只有全力解决国际大家庭的焦虑和动乱的原因，乐观的看法才可能持续存在。

目前局势风急云涌，瞬息万变，今天的情势判断明天可能改变，本报告就在这一非常时刻编写的。虽然有些观点只能是暂时性的，但是我还是想先看看整个情况的光明面。

在报告所述的这一年，联合国相当顺利地进行了种种行动，目的是在一些遭受战乱或动荡的社会实现和平过渡。目的虽然如此，但是行动却有许多不同的方面，而维持和平与促成和平这两个因素相互结合，致使安排这两种行动的传统观念起了根本的变化。在以前，维持和平基本上是指控制或制止冲突，而促成和平则是指冲突的解决。然而联合国逐渐深入而积极的参与日益显示，促成和平本身当然决定传统所了解的维持和平的规模、范围和时限；往往必须两者结合为一个完整的任务，动乱的地区才能获得真正的和平。这里我要特别举出在纳米比亚进行的错综复杂的行动以及在中美洲进行的若干其他行动。所有这些行动都产生了一些新的眼光，大有助于联合国今后受命处理其他甚至更为复杂的局势。尽管在其他地方解决困难问题时会遇到各种政治障碍，但是只要获得会员国的必要支持，经由联合国的安排实际提出解决方案，其切实可行已经不再是有争议的问题。

纳米比亚的问题显示，不屈不挠地寻求国际争端的公正解决办法，必有结果。大会第一次就该领土地位通过决议以来几乎过了四分之一世纪；而安全理事会就其独立制定解决计划，也过了十二年，经过希望和挫败交替出现的曲折过程，联合国终于在这一年达成了它的目标。从制定到达成这项目标，所经历的时间也许可以而且应该缩短，但是所取得的成果不可能比这更能令人心悦诚服。我个人感到愉快而满足，因为这是我就任现职时给自己定下的一项优先工作。

纳米比亚经验令人注目地证明，通过多边努力，联合国主要机构的积极参与，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和其他国家在与当事各方进行谈判时发挥关键性的作用，是可以取得重要成果的。集中力量于这个主要的目标，确保了由几个战线发动的外交工作得以汇集在一起。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实际上发挥了远比其他名称所含的更大的作用。它证明即使在乍看起来最没有希望的地方也可以实行民主的程序。它也证明联合国有行政能力来顺利地办理一项艰巨的行动。这次行动将来自100个以上国家的8000名男女组织起来，共同致力于按照安全理事会制定的方式，和平地促成一个国家的独立。

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对南部非洲的局势已经有了积极的影响。我征得南非政府的同意于6月间派往南非的联合国正式访问团指出，南非即将跨进一个新时代。但摧毁种族隔离制度的政治进程仍在初步阶段，而种族隔离结构、可疑的警察作风、压制性的法律和政治暴力的继续存在仍造成种种困难。社会的根本改革所带来的恐惧和不安也不能低估。

然而，酝酿有利于谈判的气氛已经有进展。最近南非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发布的联合声明，希望通过释放政治犯和修订现行保安法等措施，加速以谈判解决问题的政治进程，是对局势的一个推动力。非洲人国民大会宣布暂停一切武装行动，也是一项意义重大的进展。令人遗憾的是，最近几周暴力事件的激增造成无数伤亡，危及政治对话，使上述可喜的发展受到阻碍。这个问题有待所有有关方面在最高层次加以紧急处理。

不久的将来在南非实现无种族区分的民主制度已

梦想。这一点所具的意义远超过一个多进行长远有益改革的意义。这意味着联的实现，而这就是《宪章》所揭示的国际稳定的根本条件。

国按照第二次埃斯基普拉斯会议协议的洲的和平作出了种种努力。联合国在中事务是非常复杂而且多种多样的。这通并且不断调整适应，往往使用各种新年10月，我任命了一名个人代表，负责平进程，以便协助我协调执行这些多方

解决尼加拉瓜冲突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观察团(核查尼加拉瓜选举观察团)监由公正选举的筹备工作和选举过程，这次核准在一个会员国境内执行这种行的成功导致联合国在该区域权力的和平了核心的作用，过去该区域权力的和平非常规。

助核查委员会(支助核查委员会)的范围尼加拉瓜反抗力量成员的自愿解散方键作用。该委员会是我与美洲国家组织美洲各国总统的请求，共同建立的，它在瓜反抗力量同意解散方面，发挥了重大核查委员会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及专员)的作业支助下，正在协助他们重定居。

毁尼加拉瓜反抗力量成员的武器以及核反抗力量成员能够在尼加拉瓜境内解散的国中美洲观察团(中美洲观察团)执行。是联合国在该区域的第一个维持和平行任务是核查中美洲五国政府遵守它们在第二次埃斯基普拉斯会议所作安全承诺的情况。

，中美洲五国总统请我更积极地进行外解决该区域尤其是萨尔瓦多冲突的办我设法寻求该区域以外的国家支持这些办助下，萨尔瓦多政府和法拉本多·马蒂(马解阵线)在4月同意在我主持下，展以期通过政治手段，迅速结束十年来使

该国陷于分崩离析的武装冲突，并促进该国的民主化，保障人权毫无限制地受到尊重及使萨尔瓦多社会重归团结。

谈判的第一个目标是就许多问题达成政治协议，以便在联合国核查下实现停火。在我的代表充分和积极参与下，目前已经就一项关于尊重人权的文件达成部分协议，该文件规定了史无前例的一个长期全国接受联合国监督的办法。预期联合国也将发挥作用，监督1991年3月选举的筹备进程。

但是，涉及的各项问题不仅根深蒂固而且非常复杂。这些问题涉及国家的结构和社会的组织。除了人权、司法和选举制度、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外，核心问题是武装部队的问题，包括部队与民政当局的关系和军事机构在社会上的作用等。同拉丁美洲其他地区一样，如何处理过去的问题也是议程上最重要的问题。正在进行的谈判，有可能导致萨尔瓦多社会积极的转变，这将依照第二次埃斯基普拉斯协议所揭示，加强建立和平与巩固民主之间的联系。

因此，初步目标尚未达成，萨尔瓦多内战仍未停止，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仍然深信，如果当事各方坚决遵守它们在4月作出的承诺，并且该区域以外有能力的国家给予坚决的支持，这个进程是可以成功的。但是，没有这样的遵守和支持，战争结束将遥遥无期。

三月里展开了一次进程，其最终目的是谋求危地马拉国内武装对抗的政治解决。在根据第二次埃斯基普拉斯协议设立的危地马拉民族和解委员会主持下，这项努力目前已取得危地马拉全国革命联盟和各个政党以及该国各方面社会力量的参与，最终将导致政府和武装部队同危地马拉全国革命联盟的对话。由我任命的一名观察员正在参与会谈。这项努力已经顺利展开，我希望它能推动一个进程，导致这个久经苦难的国家实现和平及民族和解。

在解决西撒哈拉问题方面继续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我们现在不但已有协议的一套提案和一个执行时间表，还有安全理事会在六月核准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规定举行公民投票，使西撒哈拉人民能够在不受军事或行政限制的情况下决定其前途。

今年七月，我派遣一个技术团前往该领土和邻近国家，以便仔细拟订上述计划的行政策略，并收集必要资料以便估计这项行动的费用。我不久就会再次向安全理事会提交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

我一直与摩洛哥和玻利萨里奥阵线等有关各方接触，并一直与阿尔及利亚和毛里塔尼亚等和平进程观察员接触。我还与非洲统一组织主席一直保持密切联系。我在三月份访问了该地区，并与摩洛哥和玻利萨里奥阵线的领导人再次举行商讨。他们的继续支持和合作是我们的努力取得进展的关键。

调查合格选民的问题是举行公民投票的关键要素。鉴于西撒哈拉的社会结构，各族的公认领袖在这一过程中将起极重要的作用。因此，邀请了一组具有代表性的西撒哈拉各族领袖前往日内瓦与调查委员会进行会谈，以便向他们扼要介绍调查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和采取的工作方法。我又致力确保直接有关的人民明白和充分了解这种调查工作和公民投票的实际进程。

我无意低估我们面对的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但是，鉴于各方给予合作和抱持政治决心，我认为我们有把握解决这个旷日持久问题。

现在人们广泛认为，柬埔寨冲突不久可获得解决。今年八月底，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以扩大联合国的作用为基础，就政治全面解决的框架达成了一项协议，而柬埔寨各方最近在雅加达决定接受这个框架和组成全国最高委员会，这些是朝向谈判进程迈出的重要步伐。我深切希望有关各方大力推动这一进程，以便能够再召开巴黎柬埔寨问题会议，最后拟定和签署一项全面和平协定。结束战斗和解除柬埔寨人民长期忍受的苦难的时机已经来临。但是，要建立持久的和平，最终要看柬埔寨人民能否达成真正的民族和解，也要看直接或间接卷入这一不幸冲突的各方能否给予充分支持和合作。

过去一年来，我一直与有关各方密切地展开工作，并在需要时进行斡旋，以便促进谈判进程。今年二月初，我设立了秘书处柬埔寨问题工作组。从那时起，我派遣了四个调查团前往该国，以期收集与稍后的联合国柬埔寨行动有关的资料和数据。联合国当然

要准备在柬埔寨承担各方同意并经安全理事会核准的任何适当任务。不过，我必须极力强调需要确保最后交给联合国的任务是切合实际的、有明确规定的、可以实际执行的任务。及时地、固定地向联合国提供充足的资源，以便在执行一项有效行动时有合理的成功机会，也是极为重要的。

去年我就柬埔寨问题展开的努力是以寻求完成1989年6月两族领导人所达成的一项全面协议纲要的办法为主。正如我提交安全理事会的报告所说的，仍然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同时，我对谈判进程毫无进展和该岛局势恶化感到关切。

同时，使我感到鼓舞的是安全理事会的积极参与。去年，安理会几次一致强调重视及早谈判解决柬埔寨问题。安理会第649(1990)号决议申明和澄清寻求解决办法的方向，并在1990年7月19日的声明中表示赞同我关于完成上述纲要和推动谈判以期达成全面协议的行动计划。如果双方接受安理会的呼吁，开展合作，促进和解，并且愿意抱持折衷的态度来解决各项问题，则这些事态发展可以作为取得进展的基础。

过去十二个月来，阿富汗人民继续忍受苦难，巴基斯坦和伊朗境内的难民数目基本上保持不变。但是，在国际一级，保证国和阿富汗的邻国在寻求共同意见方面有所进展。

我认为这种国际共同意见是鼓励阿富汗的政治进程所需要的，而后者又可以使阿富汗人民顺利地行使其自决权。我最近的努力特别以促进这一共同意见为主，而我收到有关各国政府的答复中明确反映大家希望通过政治的方式达成解决。我与阿富汗各阶层领导人接触时已说明，联合国愿意按照他们认为适当的方式协助他们，开展一个政治进程，从而建立一个基础广泛的政府。现在，在国家与国际两级，都有机会展开集体的和协调一致的努力，找出解决这一冲突的办法。

虽然今天世界上许多地区充满着和解的精神，最近几个星期中东却出现新的、令人震惊的危险。在我担任秘书长的整个时期内，我再三强调必须为这个区域所面对的复杂问题寻求一个全盘的解决办法；我指

出，一个地区情况的恶化几乎必然在其他地区产生回响。1990年8月2日开始的一些事件，以及因此而引发的种种事态发展，都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伊拉克入侵并宣布兼并科威特国，引起了安全理事会的历史性反应。安理会史无前例地通过了一系列决议，确认这种行动直接违背《宪章》原则和国际法，不能逍遥法外。安理会立即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要求伊拉克立即无条件地撤出其所有部队，呼吁伊拉克和科威特立即进行密切谈判，以求解决两国的争执，并表示支持在这方面的一切努力，特别是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努力。伊拉克不遵从这些要求，安理会便根据《宪章》第七章实施经济制裁，以期终止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和占领，恢复科威特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安理会进一步宣布，伊拉克兼并科威特完全无效。关于在科威特和伊拉克的第三国国民的情况，安理会要求伊拉克准许和便利他们立即离境，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危害他们的安全或健康。安理会还要求伊拉克撤销其关闭各国驻科威特外交和领事使团及取消使团人员豁免权的命令。伊拉克仍然不遵守安全理事会的要求，安理会因而呼吁“同科威特政府合作的正在该地区部署海上部队的会员国，必要时在安全理事会权力下采取符合具体情况措施，……确保严格执行”经济制裁决议中的规定。为此，提请各国协调行动，酌情利用军事参谋团的机制。安理会强调，唯有安理会自己，或通过安理会第661(1990)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才能确定是否出现人道主义情况，需要向伊拉克或科威特境内平民提供食物，以减轻人们的苦难。虽然目前也许还不能预料这一危机的结果，但在运用法治保障会员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方面，这些决议一定会始终具有确实的重要性。

入侵科威特也造成极为惨重的人类悲剧，其各方面影响仍然难以估计。住在当地的几十万第三国国民一夜之间陷入困境；其中许多人无力维持家计，更无法回到原籍国，而那些国家本身也在这次危机的经济影响中挣扎。国际救济工作已开始应付所产生的巨大需求，不仅向分散在五个国家的流离失所的人供给临时住所和食物，并向想离开该地区的人提供交通工具。我已经任命一位私人代表，协助我进行这些工作。目前伊拉克决定限制某些国家国民的行动，使紧

张气氛升高，仍是使国际社会非常忧虑的一个因素。

很明显的，在按照安全理事会的立场开始谋求解决当前的危机期间，该区域包括阿以冲突在内的整个局势不可能有进展。令人失望的是，促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对话的努力，已经陷入僵局。起义运动不久就要进入第四年，遗憾的是，被占领领土的局势仍然黯淡，毫无早日获得进展的希望。我还是相信，除了以种种努力去促成一次对话外，安全理事会可以再度表示决心执行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从而对这一进程作出重大贡献。我认为这两项决议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政治权利(包括自决)，可以构成该地区达成公正、持久和平的基础。

自从我上次提出报告以来，伊朗和伊拉克的关系已经改善，因此有可能执行安全理事会第598(1987)号决议中的几个重要方面，而联合国驻伊朗和伊拉克军事观察团得以履行它所担负的任务。在这方面，已经撤军至国际公认的边界，现在战俘正在按照条约和伊朗及伊拉克都是签署国的公约遣送回国，与家人团聚。但是值得指出的是，第598(1987)号决议是一个全面的和平计划，而其中若干内容还没有做到，包括决议的第8条就没有做到。该条设想寻求加强该区域安全与稳定的措施。在现阶段，这方面是关系最深的。

整个中东仍然是今天世界上最富爆炸性的区域。多年来长期的积怨又因为该地区处处军备竞赛不断升级而更形恶化，军备竞赛的积储造成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致命军火库。从长期观点看，唯有以国际法原则指导国与国间关系、唯有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唯有被剥夺权利的人的愿望获得满足、并且区域安全和经济安排——其中照顾到该地区所有各方所关切事项——建立之后，持久和平才会降临中东。

三

有人说过：经过两次摧残的战争，本世纪有两次机会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和平秩序；但都没有充分实现。当然，毫无疑问，联合国的创建及其《宪章》的通过，殖民主义的铲除，人权的普遍标准在原则上得到

接受，不折不扣都是历史上新的出发点。然而，一贯的和平战略尚未建立起来，仍是事实。失败的理由无须重述。但有一点无可争议：我们现在有一个独特的机会来制订这样一个战略。

重新恢复的政治意志和长远的想法，不受眼前观念和利害所支配，是掌握这一机会的一个绝对要素。清楚了解有什么手段可以用来创造、维持和增进和平，也是一个绝对要素。必须以同等的决心来追求这三条相互重叠的努力方向。我以前说过，必须靠调解争端或解决冲突的努力来准备和确定维持和平或控制冲突。当然，争取时间并创造环境以解决引起冲突的争端，永远都是一项紧急需要的工作——根据历来的理解，这是维持和平行动的基本理由。但是，这样做有时可能造成局面的拖延，除非同时进行或直接导致进行谈判解决争端，并在必要时展开行动落实这种解决办法。这两件事应视为一种更广泛的工作的一部分，而这种工作就是创造条件，以便消除各国对立的主张或利益中的暴力敌对的性质。

四十多年来，有各种不同的情况证明不能不由联合国展开行动。在当事各方同意后展开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基本上包括部署统一指挥的国际军事人员配合文职人员，全部置于联合国的权力和管理之下，以便制止或避免战斗，并协助促成或执行一个解决办法。当事各方的同意与维持和平行动的任务密切相关，所以这种行动应与《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措施区别。

自1948年以来，联合国进行了18个行动，其中五个是1988年和1989年开始的。联合国近年发挥了维持和平与促成和平的两种作用，确实进展神速。最近这几次行动的综合性质，表示它们所承受的任务大大地增加了。联合国纳米比亚过渡时期援助团提供了一个突出的例子：它拥有大量民事人员和警察人员，同军事人员共同致力执行在它监督和监察下的一项复杂和平计划。在尼加拉瓜完成的微妙任务也告诉我们联合国主管机构交付给秘书处的任务，可以有多种的形式。

这些行动获得成功的条件仍然和以前一样：一个明确、可行的任务规定，当事各方的同意与合作，安

全理事会的一贯支持，会员国愿意自愿提供人员以及充足的财政安排。为了满足所有这些条件，必须假定没有任何不确定的因素：对任何一点抱有怀疑都会危及一项行动，威胁到参与人员的安全，破坏和平，牺牲人命，一定会破坏行动的目的。并且，一个复杂的大规模行动，象纳米比亚行动以及很可能即将决定的柬埔寨行动、萨尔瓦多行动、西撒哈拉行动，需要长时间的规划和准备，而一项解决办法一旦达成协议，必须紧急执行。在联合国现行的行政和财务状况下，要调和以上两种要求是极端困难的。人们现在要求我们以较少的资源去做更多的事情，而且即使是这样少的资源有时候还不能及时获得。

责任和资源不相称，在任何方面造成的损害都没有比对联合国行动损害更大，也更危险。我要求各会员国再次审查我的建议：就是设置维持和平所需的基本装备和用品的储备、指挥军事人员、保证必要的后勤和技术支援、增加周转基金和提供可靠的现金捐款。可以预料，秘书长往往需要事先获得授权，承付款项，使他能够在政治上可以接受的时限内，组织起一次行动。主要的一点是，现在我们已经完全能够看到，临时抱佛脚是有其局限的。

从行政观点看，无论在总部或在当地，维持和平行动都必须得到十分密切的协调。为此，我在秘书处内设立了一个高级规划与监测组。

由于催促解决冲突局势的要求日益紧急、由于纳米比亚和尼加拉瓜两个行动有显著的成就、以及柬埔寨、萨尔瓦多、西撒哈拉行动的前景不远，所有这些都鼓励我们去思考：是否可能把联合国行动的原则扩大到其他与目前执行的行动不完全相同的情况。我相信，在这一点上有必要提出几点警告。除了联合国行动必须获得主管机构的授权之外，这些行动只有在合乎若干条件时才宜于进行。第一，必须主要是应付明确的国际性情况才可以要求执行一项行动。第二，如果需要监测一次选举或全民投票，联合国行动应当涵盖整个选举过程，以保证合乎公正不偏的条件。如果有关国家的政府在其政治生活的关键时刻邀请联合国在该国举行选举时派人留驻，并得到联合国主管机构的核可，仍然必须得到该国广大公众对联合国担任这一角色表示赞同。第三，联合国行动只有在明确界定

地点和战略后才能展开，而不能在具有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进行。

虽然联合国展开的各行动很成功是令人鼓舞的，虽然联合国行动可以适用的范围很广，但是就国际争端谈判解决办法的责任、以及是否接受安全理事会为它们所定条件的义务，仍然是属于当事方。安全理事会在最近一项声明中强调，维持和平行动基本上是一种临时措施，其任务期限并不会自动延长。经验显示，仅仅延长维持和平行动，并不就会推动问题迈向解决。这种想法并不使人感到安慰，但是却不能忽略。

我们的国际社会演进到了今天的阶段，就各种各样未决争端局势筹组维持和平行动，是一种主要的挑战。现在显著地需要运用一切外交能力，使威胁或危及和平的争端得到公正、持久的解决。这些能力现在既不是、也不必是完全通过联合国来运用。

会员国在联合国以外自愿进行调停，这不但现在是、而且永远都是和平解决争端的办法之一，也是各国政府表明它们的外交政策和运用或增加它们影响力的办法之一。然而须要谨慎考虑的是，这种与联合国无关而试图解决重大区域冲突的努力，在扫除障碍、缩小争端双方的歧异方面，究竟获得多少成绩，足以达到进行切实谈判的程度。这里所指的问题就是，与其他办法相比，有系统的、有针对性的多边努力的潜力有多大。

现在似乎还有一种残留的想法，认为会员国或区域组织采取外交主动，不遵循联合国的程序，比通过联合国采取的行动更干净利落、更迅速、更可能有成果。至今得到的证据，即使不是完全令人失望，至少也是很模糊的。

联合国处理争端的特点是，它允许所有有关的利益和观点都获得充分反映，不会为了迅速予以处理而想把一个局势中的任何重要关键问题加以压缩——包括正义和人权。其次，近年来联合国还越来越多地采用了某些方法（安全理事会内的协商、秘书长的斡旋），其结果是避免了无益的争辩，并寻求能够找到公正解决办法的方针。现在应当很清楚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辩论场所，而且也是进行有意义的谈判的场所或机构。

这方面需要得到会员国特别是最具影响力的会员国更广泛的了解。尽管联合国最近在解决冲突方面成绩斐然，在处理危机方面也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但是，假如会员国个别地或组成区域集团，为追求私利而选择采取与联合国的行动或《宪章》的原则不符的行动，联合国仍然有被忽视和被排挤在一边的危险。这主要不是维护联合国威望的问题，而是要避免在维护和平的努力中步调不一，力量分散和零敲碎打。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间逐渐呈现的和衷共济精神是预防这种危险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保障，但是，正如我在去年的报告中所说的，如果要对世界局势产生预期的影响，大国之间的协议必须得到大多数会员国的支持。国际社会乐意赞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最能消除一种很可能令人忧虑的印象，即世界大事是由一个理事会来决定的。

除此之外，我相信，如果安全理事会有一个和平议程，内容不限于讨论那些应会员国要求而正式列入议程的项目，如果安理会能举行定期会议，审查政治局势和查明哪些危险情况可能需要采取预防性或预先进行的外交活动，则联合国促进和平的能力将大为加强。这种会议的记录不必公布，所以可以鼓励坦白的讨论，而不会使争端各方的立场趋于强硬。秘书长向这种会议提出的报告也不一定是援引《宪章》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当正式程序不大可能导致和平的结局时，用正式程序去谋求和平是没有什么用的。还有一些加强安理会处理刚发生的争端的的作用的其他方法：改善实况调查安排；由联合国派遣人员驻在不稳定地区；适当时设立附属机构从事预防性外交活动。

在这方面，必须再次强调，目前秘书长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收集及时的、准确的、不存偏见的资料，而这些资料是避免暴力冲突所必需的。我曾于去年的报告中就此提出一些建议，现在我要再次敦促各会员国重新考虑如何帮助秘书处从一个明确的公正立场来监测潜在的冲突局势。和平战略需要掌握时机，要比目前掌握得更好。联合国的调解与调查能力不能保留不用，直到为时太晚，不能避免冲突。

任何一个争端，或者一个可能导致国际摩擦或争端的局势，一旦经过安全理事会的调查和审议，安理会就有责任提出适当的调解程序或方法。过去存在

的、使安理会难以作出决定的各种分裂和困扰因素，现在已经大半不存在了，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如何确保争端各方遵守安理会的决议。

这也跟着引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最有效地利用安全理事会所掌握的规劝、影响和施加集体压力等手段来对付一项威胁和平、破坏和平或侵略的行为？当然，《宪章》第七章的规定所设想的集体安全系统的重要性，是毫无疑问、无庸争辩的。如果安理会不能发出确实有效的警告，声称不惜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如果不听从警告时安理会不能采取这种措施，则促进和平的工作将缺乏必要的坚定立场和权威性。安全理事会对伊拉克侵入科威特的挑战作出迅速反应，这就表明安理会中存在的新气氛使它第一次能够行使《宪章》赋予它的权力。

凡是需要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的局势必然都有它独特的地方。但是，似乎获得普遍承认的是，这种行动是最后手段，它并不表示放弃根据《宪章》的原则作出必要的外交努力，商讨解决办法。其实，援引强制执行条款的本身也必须始终不渝地根据原则和公平的观点意识，并且应该人人认为如此。

此外，我们这个时代的情况也明显地指出了一些强制执行行动的成功条件。在经济领域中，必须全面预料到一个或几个国家由于执行根据第七章采取措施而面临的特殊困难，并为它们设想出迅速的补救办法。第五十条承认了这种需要。今天的情况远比四十年前更为复杂和相互依存，因而需要应付经济上的连锁反应。在政治领域中，所有的强制执行措施都必须被视为根据集体承诺而产生，它需要依照安理会的规定保持完全一致的目标，也需要有自己的一套纪律。按照《宪章》第四十六和四十七条的明白规定，军事参谋团有责任拟订使用武力的计划。再者，执行强制措施的方式不应引起可蔓延到所涉地区以外的意外经济或政治后果，从而破坏了安理会当初采取行动的目的。

在国际事务中，还应当更多地利用国际法院来促进法治，这不仅限于裁决法律性质的争端，并且也包括就争端的法律方面提出咨询意见。《宪章》第九十六条授权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请求国际法院发表这种意

见。我相信，如果扩大范围使秘书长也具有这个权力，必能大大增强和平解决国际危机的手段。提出这项建议，是因为安全理事会与秘书长之间有着互相配合的关系，也是因为考虑到几乎所有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都需要秘书长进行艰苦的斡旋。

四

1990年代，要在世界上缔造和平和创造稳定的条件，必须拿出新的对策来应付在安全方面与过去遇到的根本不同的挑战。但是，这种努力必须坚决根据《宪章》的原则，而且人人认为是这样，才不会变成茫然失措。一些老的模式再也不能使用，一些传统的思想范畴已不适当，但是《宪章》阐明的国际道义和人权原则依然有效。

当前，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所面临的威胁已不象过去可以截然区分。不少国家的内部纷争夺取了许多人的生命，其影响超越了国界。一国政府机制和社会制度解体，另一国胡乱杀戮则是两个骇人听闻的例子。分裂主义远非罕见的现象，它既在直接受影响的国家又在毗邻的国家造成紧张，一国的无政府状态意味着民众大迁徙，使另一国不得安宁。还有跨越疆界的恐怖主义和毒品贩运。环境的灾害也是这样。此外，种族、语言或宗教特征意识的提高动摇了一些国家的现有组成，社会因经济不平等而崩溃，贫困和压迫的双重罪恶撕裂着和平的机体。

我们即将跨入的时代有可能看到民族国家机制受到历史上空前严酷的考验。不同的力量拉它走不同的方向。在政治稳定的环境中，各国形成了更大的职能整体；一个杰出的例子是十二个西欧工业国预计将于1992年实现经济一体化。回顾本世纪中叶以前，民族主义在欧洲一再煽起自相残杀的战火，这种革故鼎新，对整个世界社会的政治演变都具有重要意义。可是，与此相反，政治、经济或与人权有关的种种因素削弱了民族结合的观念，不少国家正面临解体的危险。许多国家脆弱的国家结构因缺乏民主责任制或因过度中央集权而更形脆弱。极端民族主义、激烈的种族抗争、仇外心理和种族或文化偏见，往往填补人们

因为觉得缺乏合法性或社会正义而造成的心理空虚。在这方面，我们不能忘记这些破坏稳定的因素并不仅仅存在于世界的某一个区域。事实上，在本世纪上半期，这些因素在欧洲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现在，如不按照《宪章》规定的方法处理，这些因素可能毁坏世界更多的地区。

在另一方面，经济力量使得民族国家愈来愈依赖国际合作。这些力量不允许民族主义赖以滋长和孤立主义赖以立足的自给自足观念存在。不论在富裕的环境里，还是在匮乏的条件下都是这样。在前一种情况下，投资已日益跨国化，不同国家的公司的横向联合，对生产、定价、资源流动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对就业机会，都产生更大的影响，各国政府如不互相协调政策，则越来越难以稳定国民经济。敌对性经济竞争的破坏性后果也不容抹煞。至于处境不佳的国家，对外部经援的依赖必定会带来深刻的政治后果。提供经援的条件往往对社会情况产生直接的影响。

这些进程将如何影响世界的政治结构，民族国家能否经受新的压力，从而发生变化，目前的国家结构在今后还能维持多久，都是些难以解答的问题，然而置之不理又是不明智的。不过，民族主义如果与国际合作背道而驰，并漠视世界对人权的关注，显然就不可能维持任何国家结构。

有些人认为联合国可以研制一项整体计划来应付这些挑战。在理论上这或许是可以设想的，但在实践中，在发生性质不同的情况时，则是行不通的。而且，多边行动并不能消弭社会的所有苦难。实施这些行动的原则来自我们当代安全的全部涵义，来自经济和社会发展同安全问题的关联，来自预期和防止发生问题的必要性以及来自一旦发生问题即设法帮助减轻并推动采取矫正措施以防止其再度发生的必要性。这意味着全球保持机敏、全面和有效的警觉，而不是绘制一个蓝图。这意味着监测跨国趋势并将联合国的权力发展到相应的水平。

为应付对安全的新型挑战，区域安排或区域机构可以提供宝贵的协助。前提是《联合国宪章》第八章所设想的同区域安排之间存有关系。许多情况都适合于采用区域行动来缓解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以及和平

解决地区性争端。但有一个条件，区域机构的努力应与联合国的努力相协调，并应依照《宪章》的规定。这同样地适用于世界各地的区域安排，包括可能在欧洲出现的安排。此外，不能光把《宪章》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视作形式和程序，要把它看作是和平努力的实质有关。如果区域对影响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所作的反应以及处理这种局势的步骤是支持联合国表明的政策路线，而不是在无意之中把联合国搁置一边，不仅会大大加强一个和平战略的连贯性，而且还会提高其效力。同样，必须运用全部《宪章》的规定，而不是只用其中单独几项规定，对世界形势发生影响。

全世界的政治家都察觉出，在建立公正和稳定的和平秩序的工作中，有许多无形的因素。但是，在联合国的工作上，已清楚确定了一些优先事项。当前形势下最迫切需要的是减少各国拥有的武器和武装部队的数量，建立一种世界性人权制度，协调一致地应付环境退化和人口爆炸带来的挑战，建立国家之间比较公平的经济关系，解决全世界的社会问题。这一切都与和平息息相关。

五

由于东西方关系迅速改善，新的安全局势正在全世界形成。国际社会长期盼望的各项裁军措施也终于有实现的可能。

目前我们目睹一种情况，即政治上的发展早已快速超越限制军备和裁军谈判的谨慎步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支配军事思想和计划数十年之久的理论突然失去了意义和用处。因此，现在需要探索适当的安全体制来取代以往敌对战略。

当前这项进程的意义远远超过所涉武器和军队的数目。目前大家已经普遍认识到，只有设立一个建立信任措施的系统，才能消除猜忌和错误判断，两者一直都是军备竞赛的根本原因。这项认识，对于逐渐减少军备和军队数量而不减损安全的原则，已赋予新的意义，并证明这项原则的正确性。

如果说我们已经渡过惊涛巨浪，今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不会再出现任何意外情况，那是幼稚、危险的

想法。过去几个星期波斯湾出现的爆炸性局面就清楚显示,要使目前这种积极的趋势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并且成为真正世界性的趋势,则仍要适当地处理许多棘手的问题。一些长期存在的难题仍然阻碍着和平关系的发展,而国际议事日程上目前又增添了新的难题。1990年代初期为限制军备和裁军提供了一个机会,我们不能浪费这个机会。

核武器这一关键问题仍然是战略关系上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这方面应着重指出三项令人关切的问题。

第一项令人关切的问题是美苏两国关于大幅度裁减其战略武器的双边谈判进程取得进展的关键意义。这项过程应最终扩大到包括所有其他类型的核武器,包括其他核武器国家的核武器。只要有些国家宣布的政策中没有设想到一个无核武器世界,那就很难预见会消除所有核武器。不过,目前创造一个道德和政治气氛,使这种武器遭到非难和摒弃,这倒不再纯属空想。

第二项令人关切的问题是停止核武器试验,这个问题至今仍然存在着不同意见。缔订一项全面禁试条约依旧是首要目标,但在实现这项目标之前,每年进行试验的次数及其威力都应当并且可以大大减少。

第三项令人关切的问题是亟需维持一个不扩散核武器的可行体制。自1968年缔结《不扩散条约》以来,事态发展已显示出它的种种缺点。我们得承认,在某些方面,这项条约所规定的义务并不均衡。不过,由于目前并没有更好的安排来取代,必须坚持并促进这项条约防止核扩散的基本目标。

我们喜见核武器储存量的裁减,并希望会有进一步减少,最终导致全部销毁,在这时刻,容忍任何新的核武器国家的出现,不论它们是潜在的或尚未公开宣布的核武器国家,都是不理智的。会员国国家安全的正当顾虑应毫无疑问地充分顾及,但让更多的国家取得核武器,其危险程度不亚于核武器国家继续进行核军备竞赛。建立有效的障碍以防止任何方面的核武器扩散,应该列为最高优先事项。在这方面,我欣悉一些区域已建立无核武器区;这些区域的有关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而无核武器区的建立又得到广泛的支持。

尽管核武器问题极其重要,但不能也不应转移对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注意,这些武器毕竟仍然使世界各国普遍深感焦虑。化学武器以惊人的速度扩散,并且已有在冲突中实际使用这种武器的危险。这方面所涉的各项基本问题已经是今年多边谈判的主题。不过,至今仍没有出现我们翘首以盼的突破。只有通过明智的妥协并集中精神注意主要的目标,才能克服其余各项障碍。已经拟议举行的部长级裁军谈判会议,如经适当筹备,会有助于达成这项目标。应迅速完成必要的工作,以提出一项所有会员国可以迫切加入的公约。这将是停止拥有化学武器对人类所造成的威胁的最有效途径。

在维也纳,拥有最大量常规武器的工业国家即将达成大幅度裁减这类武器的协议。但这种积极的趋势并未反映在世界的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开支,据最近估计,几乎占中央政府预算的五分之一。从前,在主要国家集团由于长期紧张关系而竞相展开漫无止境的军备竞赛之际,很难向发展中国家说,它们应该进行真正的裁军。现在,在全球局势转好之际,各国应当可以用尽可能最少的军队和军备,来谋求它们的安全。

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进口武器,因此近年来军火交易减少的现象可视为是一种正面的趋势。但是减少武器进口主要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目前遭遇经济困难,而不是因为这些国家对国防问题的姿态有任何重大改变。裁减军费和减少购买武器的基本先决条件是政治气氛的改变,其特征是地方性紧张关系的缓和、争端的和平解决以及区域性的建立信任措施的制订。

由于欧洲的武器可能大量减少,过剩的军火却可能转往世界其他地区,这种可能性令人深感不安。因此更加迫切需要寻找限制这种军火转让的办法;所有供应武器的国家都需要注意它们在这方面的责任。我吁请各国真心诚意地考虑实行国际武器转让的登记,作为限制这种兴旺行业的办法。

让发展中国家毫无阻挠地获得现代科技的惠益固然极为重要,但这并不是说要以军备质量的竞赛来替代军备数量的竞赛,或引进高度技术性的武器来破坏区域或甚至全球的安全。我建议国际社会作出特别努

力,澄清所涉的各项重要问题,并提出明确、公平、能被所有各方接受的指导方针。这能消除一大批国家的许多疑惧,而它们都受到技术出口国家目前所采用的供应政策的影响。

从军事经济转变成民用经济的过程可能艰难万分,在短期内可能造成一些经济上的混乱,但必须考虑到这方面的长期效益才能缓解在这方面的疑虑。更广泛地交换这种转变的经验和进行国际合作都有助于调整过程。我们相信这种交换和合作的方式和形式都需要经过详细拟订。最近,秘书处组织了几次讨论会,通过高级别的讨论,已加深了对所涉各项问题的认识。

限制军备方面的形势好转激励了本组织内的裁军机构,也对它们的工作给予了新的意义。最近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工作的合理化,使该机构又生气勃勃。目前也是考虑精简其他裁军机构工作的适当时机。要使本组织能够处理需要国际一致行动的问题,这是必须进行的工作。

六

解决冲突,重视人权,促进发展,三者一起编织出和平,抽除其一,就会拆散和平。

这就是多少年来联合国思想和工作的一个主旨。目前的经验有力地证实了这个事实:对国家机关和体制的尊重,民族的团结,政治制度或社会思想的存续,经济发展的持续和国际秩序的稳定,都大大地依赖于人权的重视和促进。

过去一年,人权从国际讨论的次要主题变成主要关切的问题。世界各地重新认识到:任何一个社会或政治体制,如果不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男女的平等权利及大小国家的平等权利,都不可能也不应当持续存在。

联合国从初创以来,一直就在致力于拟订各项人权文书和建立行为标准引以为据的基准的工作。联合国向世界提供了由《世界人权宣言》和两项《国际盟约》所构成的国际人权法案。根据这一法案,保护基本权利被承认为一项永久的义务。在联合国主持之下,已通过了许多其他法律文书来界定各种情况下的这些基本权利。1986年的《发展权利宣言》奠定了基础,把人

权的概念纳入发展项目的规划、执行和评价之中,因而不但加强并且保证了对人权的尊重和这些项目的效率,把人权纳入各项国际公约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今年,向国际社会提出了保护移徙工人及其家属权利的公约,这些人是社会上最脆弱、最易受到伤害的群体。

然而,法律文书仅仅提供了人权结构可以依据的基础。法律文书的实施还需要行动、机智、机会与合作。举例来说,秘书长往往必须在这方面行使最为机密的斡旋,以免发生反面效果。然而,全世界各国人民对联合国在人权受到否认或侵犯之处致力恢复人权的努力怀抱信心和期望,这是无可怀疑的。

去年虽然在民主和人权方面有相当可喜的进展,然而我们却不应忘记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的冷酷现实。几乎每天都听到这样的消息:个人遭受酷刑、杀害、失踪、手无寸铁的示威者横遭枪杀、暴力镇压异议人士、歧视和剥夺,这些消息显示我们的法律文书与世界上无数人民被迫生活的情况之间存在鸿沟。

我们的目的是缩小期望与事实之间的差距,强力而有效的国际规范是必要的,但这还不够。在国家一级,必须培养并且发展出一种根深蒂固的具有劝服力的人权文化及其实施手段。联合国发起的世界人权运动的目的是使人们集中注视人权的重要性和内容。另一个提供服务和技术援助的方案则谋求进一步创造并增进各国的人权基础结构。

联合国在努力满足所有区域对人权的期望时,依赖各个非政府组织承担义务以及世界各地人们表现勇气和自我牺牲。他们有时冒着生命危险促进和保卫人权,他们值得我们的钦佩和支持。联合国应密切注意以各种方法和手段协助和保护他们达成任务,并鼓动群众支持我们不断努力,使人权制度遍及全世界。

联合国监测人权情况的职责,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力量,特别是通过信实认真的记者报道违反行为规范情事的工作,也变得比较容易了。在许多时候,甚至在任何时候,粗暴侵犯人权的事件很快地就传遍了全球,引起人们的义愤和抗议。然而,这往往并不是一种有效力量可以制止藐视国际社会公认标准的行径。联合国应保持警觉,确保揭发和谴责人为的恶行,以防止恶行的再次发生。

随着情况的进展，人们的要求和期望升高了，我们面临的挑战也继续增加。我认为有一件关键重大的事，就是我们应付挑战的能力。

七

《联合国宪章》指导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世界人权宣言》涉及国家与个人间的关系。如今则是制订一份管理人类与自然界间关系的公约的时候。

人类目前进行的许多活动使他们成了自然界的敌人。现在自然界也给我们传来了信息：保护大自然而得以生存，或毁灭大自然而走向灭亡。

联合国初次将环境问题列入全球议程已是近二十年前的事。环境的退化虽然尚未制止，但人类已普遍觉悟到其中所涉的深刻危险。各国团结一致地决心迎接这个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近年来最为令人安慰的一个现象。“爱地球主义”的出现导致人们在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携手努力，以确保子孙后代继承一个恢复活力的星球。如今人们普遍认识到不论经济条件优越者的贪婪浪费或是贫困者绝望的生存挣扎，均在掠夺地球的资源。

过去几年虽然作了许多工作，而恢复地球生态健康的运动方才开始。我们显然必须找出一种方式，平衡地处理环境与经济发展间相关的问题，同时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合理需求。现在，东西方之间的鸿沟既已消弭，双方都有休戚与共的感觉，国际社会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机会来专心致志地讨论经济、社会和环境议程，制订蓝图，协调行动，迈向无害环境的持久发展。其中涉及的问题鲜明地突出了国家之间不论贫富相互依存的特性。这样的特性又可激发足以缩减南北差距的观念和态度。

定于1992年举行的环境和发展会议将审议关于气候改变和生物多样性这类重大问题公约。会议将设法拟订基本原则协定，用以指导环境和发展方面的国际行为与合作，并以全面综合方式处理所涉复杂问题。会议还将订出延续至二十一世纪的行动日程，考虑加强有关的体制结构和进程。筹备过程中我们必须在所有各级尽更大努力防止环境的进一步退化。在这方面，我

欢迎伦敦世界气候大会以及今年在贝尔根举行的会议取得的成果，这是与联合国系统共同求取进一步认识当前问题，协助寻找解决办法的总体努力的一部分。

终止环境损害的工作无疑地首先必须靠每一国家的主动性，事实上国家一级和区域一级都采取了行动。各国政府、科学界、工业界、传播界以及非政府和基层组织之间必须形成新的伙伴关系，确保这项工作得到最广泛的参与。多边一级也进行了许多工作。去年，关于臭氧层损耗的1987年《蒙特利尔议定书》开始生效。随后又采取了一个主要步骤，就满足发展中国家特殊需要额外措施达成了协议，并筹集了一笔经费，以便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无损于臭氧层的技术。

在联合国主持下，还进行一项关于气候改变的速度、性质和影响的研究。定于今年下半年举行的一个会议是迈向制订措施、制止温室效应的危险发展的另一步骤。我希望上述工作最后能促使通过关于气候改变问题的国际公约，预计可供1992年会议签署。

去年在巴塞尔通过的关于危险废料的越界运输和处置问题公约获得的支持日益增加，这是可喜的现象。此外还制订了某些化学品的国际贸易指导方针，补充修订了一些国际行动守则，例如农药销售和使用行动守则。国际社会考虑采取的其他措施主要是建立一个关于越界空气污染这类问题的监测、研究和数据交换网。资料交换系统继续在全球各地扩展，为环境方面的各种问题提供答复。

我们现在已不能用无知作为托辞。环境改善的道路是漫长的，但其出发点是认识我们共同的弱点。这完全是个求生存的行动。

八

经济生活的各种动力和压力可以促使各国团结，也可以促使各国分离。新时代面临着种种巨大的挑战，其中之一是能否认识到在世界资源和能力所允许的最大范围内进行真正合作的可能性。要达成持久和平，就必须改善人类的境况，而后者只能通过国际社会所有成员进行各种富有成效的交往才可以成功。为

此，必须重新下定决心，更加集中力量去促进和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发展中国家尤应如此。

四十多年来，两个意识形态集团之间的紧张局势不仅影响和改变了政治制度，也影响和改变了经济关系。这个世界投下了大量资源、资金和人力去研制巧妙的自我毁灭方法。如今，在冷战之后的世界，我们有机会可以设计一个谋求公平的经济关系以及安全安排的体制。东西意识形态的分歧为经济社会因素所造成的全球和区域紧张局势的威胁所取代，这种需要也随之而更形重要。当前中东危机的一个方面严酷地提醒我们，对一种必要商品的价格和供应量不能达成协议，就会产生破坏性的后果。

1980年代的事实说明了1960年代和1970年代关于经济进展和社会进步的诺言如何难以实现。虽然有几个国家，大多数是亚洲国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可是有三大洲大体上今天不比昨天好。而且令人不安的是，这几洲大部分人口的情况比充满希望和期待的那几十年之前还要差。科技方面的重大进步使我们更加深信，我们不但能够、而且必须为经常处于饥饿与疾病之中的这样多人谋求较好的未来。

我们似乎忘记了，一切发展都必须以人为本，而且人的幸福不能光用金钱货币来衡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近编写的一份报告分析了经济增长如何转化为——或无法转化为——人类生活的改善。有些国家的人类基本发展指标，例如预期寿命、识字率、营养和儿童死亡率等，都有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可是总的来说，贫困、疾病和匮乏有所增加。人口过多和迅速涌向城市，不仅创造了经济和社会问题，也危害到安全。每年这些问题都使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口增加几百几千万人，压制了发展努力，使犯罪和吸毒等社会弊病令人震惊地增加。

如果不以有效办法来解决，许多发展中国家境内的贫穷、人口增长、商品价格偏低、债务、经济停滞、环境破坏、军费开支和社会结构腐蚀这个循环就会破坏全球和平秩序的稳定。如果不采取一致的国际行动，它就会在全世界引起政治、经济和社会动乱。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永远不受影响。每个国家都不应该自满。

当然，发展必须依靠本国努力，建立必要的机构制度，制订政策使发展事业能蓬勃起来，人人都能分沾惠益。如果没有这种决心，或者不能专心致志，国际社会在促进发展方面所能做到的就极其有限。但是，国家如果认真展开努力，则需要外来的支援和帮助。不幸的是，国际经济环境往往使多年来艰苦经营的发展工作和外国援助达不到所争取的目标。

商品价格差不多10年来一直被压得很低，加上债务负担日益沉重，结构调整方案资金不足，都严重地削弱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使其社会内聚力减退到危险的地步。

非洲国家的发展所受的挫折尤其多。它们的贸易条件恶化程度超过其他各洲的国家。它们的基础设施仍然不足，许多国家的基础设施正在腐蚀。国际社会必须赶快采取行动，加强对非洲的支助，特别是增加资金流动，免除债务，放宽贸易，以及采取适当措施去处理商品问题，包括稳定商品价格。

最不发达国家大多数位于非洲，它们面对严重的问题，在世界经济目前进行的根本变革中，它们仍然处于边缘地位。第二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已着手努力查明哪些因素阻碍它们的发展，并议定了一些紧急的、广泛的措施，以扭转目前的趋势。

国际经济的反常现象也反映于国家一级，一国之内同时存在的两个社会的差距越来越大，一个是富裕的特权社会，另一个是一无所有的贫穷社会。在发展中国家，这就是说出现了两个社会，一个掌握权柄，另一个则没有权柄；结果是政治和社会不稳定。在工业化国家，这种情况反映于紧张状态和犯罪。国家经济政策必须处理这些矛盾，确保人人分享经济和社会进步。

当前，由于中东的危机，国际社会面临若干短期的紧急情况。联合国应付人为灾难的能力再度面临考验。这次危机的影响显然使国际社会的经济问题更加严重，还可能会严重破坏若干国家的经济。代价的大小将取决于能否控制冲突，如何解决冲突。纵然如是，仍需紧急作出认真努力，消减这次危机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同时要研究如何为没有能力应付这种局势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安全网。

不管当前的危机结局如何，有些比较长期的问题

看来特别重要，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靠远见和想象力去谋求妥善的国际对策，使发展中国家能够恢复增长和发展的进程。

第一个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外债。现在已经很明显，由于这个问题很大，很严重，必须采取全面的、真正果断的解决办法。自1982年以来逐步深化的债务危机严重地威胁着许多受影响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对国际经济来说，它也是一种负担，甚至对债权国也有不利的后果。

债务问题最伤元气的一种后果是造成巨大的金融资源净额从债务国转移到债权国。发展中国家需要国外资金来补充国内为数有限的储蓄，但十年来，它们一直为世界经济提供资源，而这些资源却是它们亟需用于本国发展的资源。在1989年一年，资源流出净额已达260亿美元。必须迅速消除和最终扭转这种反向转移。在这方面，减债减息可起主要作用。民间和官方债权人以及多边金融机构正在努力处理债务问题；这种努力急需扩大和加强。对于如何处理商业债务和官方债务，现已有了若干新的、实际可行的计策。我欣见我的私人代表最近提出的关于外债问题的报告所引起的兴趣。

第二个问题，也是个同样紧急的问题，是国际贸易制度和即将结束的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工业化国家宣称决心取得实质性成果，这令人鼓舞。可是，到目前为止的谈判显示，并没有充分考虑到经济能力较弱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关切问题。乌拉圭回合的主要目标应该是达成平衡的结果，使所有国家受益，并使发展中国家能够进入现有的贸易集团和正在出现的大市场。不能利用发展中国家在这些谈判中所处的劣势，来扩大或强迫接受几个贸易大国的国家利益，从而破坏国际贸易和支付制度的长期运作。

第三，对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并在某种程度上对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商品是主要的出口收入来源。商品价格不稳和继续下跌，进一步阻碍这些国家谋求经济多样化和振兴经济的努力。必须从各个方面坚持和支持这些国家经济多样化的政策，包括使商品价格更加稳定和提高商品价格。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资金不足，现有商品协定都受到影响，实际

上没有实现它们的目标。对各项国际商品协定的方式和运作需要重新加以审查，使其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能发生作用。

第四，必须支持苏联和东欧经济纳入国际金融和贸易体制的过程，使其得以顺利过渡。这个区域向国际贸易开放，给世界经济带来一个大好机会。我们共同的目标应该是使东欧国家的积极改革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同时进行。因此，工业化国家承诺不减少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因素。

全球性国际经济问题错综复杂，彼此关联，并与社会和政治问题密切相关，因此，必须改进全球经济的管理。西欧的经济一体化和许多贸易集团的产生令人对进入这些市场的机会感到担忧。恐怕这样的发展会使国际贸易制度分裂瓦解，使现有贸易关系更加紧张，并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愈加处于边缘地位。我还担心在贸易自由化问题上越来越依赖双边和多种安排，而不是根据多边规则。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存在的各种条件影响到关于战后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国际体制安排。过去二十五年来，主要工业化国家不时在现有多边机构的范围之外设法协调它们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现在，新时代的挑战更为复杂，例如维护地球的健康和制止吸食毒品，都需要作出全球性的反应。在这些机构内按照计划和制度协调全球经济，将有助于各国和国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更趋一致，使各方的经济行为更有节制。

我们必须利用过去的经验，来构想我们共同的前景。不仅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相互竞争的优劣强弱已经清楚，反映出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张关系的世界秩序的长处短处也已一目了然。我们知道，光是改革经济制度，无法满足人民对于社会正义和平等的愿望。事实上，不论主张哪一种意识形态，关于社会福利和服务的基本原则，例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和就业，是永远不变的。

对国际机构进行认真评价和灵活改革的过程已经开始。应该根据经济关系的优点和长处建立更加公平、有效的制度。今年4月，大会讨论国际经济合作的特别会议重申联合国的特别作用，就是作为综合讨

论人类重要问题的一个论坛。多边主义的恢复将使联合国更有能力对冷战结束后国际秩序的挑战和机会作出反应。

过渡到这个秩序的道路必然十分困难。在这段时期，我们可能看到经济超级大国或集团之间激烈竞争，不仅要取得经济优势，而且要影响新的比赛规则的制订。这对全球经济的后果可能是很严重的。经济上的紧张关系将会影响到一个比较和平的国际环境的前景，而在这样的环境中，才能够有更大的决心来追求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当务之急是联合国、尤其是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如何有效处理经济问题和促进合理的愿望，从而避免冲突和缓解紧张局势。

国际社会日趋一致，有助于促进大家的认识，看到政治和安全考虑与经济和社会问题之间的密切关系。安全理事会的工作表明，它再度有了明确的目标，决心保护和促进和平，我们期望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也出现类似的情况。在这方面，我欣悉经社理事会决定在明年召开高级别特别会议，审议东西方关系的演变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我一向认为，经社理事会就重要政策问题和发展召开高级别会议，更集中精神讨论重要的政策问题和发展，对经社理事会的作用和功能必能产生积极的影响。一个恢复活力的经社理事会召开部长级会议，可以制订原则，指导不断演变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从而在平衡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基础上促进稳定。

不过，联合国、包括它的经济和社会部门的政府间结构，必须能更迅速响应社会的新需求和面临的新挑战。政治上的雄辩消退之后，需要更高度的专业能力，以加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的技术支柱。

九

今天世界的混乱和可能冲突的根源，并不局限于政治方面的紧张形势和经济方面的悬殊差异。引起混乱的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是跨越一切区域界线和文化界线的社会危机。今天，常识开始取代了往日思想方面的痴迷，我们必须经常不断地注视目前社会的各种

弊病。单靠一个国家或一些国家是无法进行诊断或对症下药；需要采取全球性的步骤和行动。

普遍发生的心理上和社会上的脱序所引起的祸患，表现最为明显的形式就是吸毒和毒品的贩运。毒品祸害在各个层次造成损害：除了对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扭曲损伤以外，还使整个社会付出高昂的代价，这表现在医疗保健、意外事故增加、工业生产损失、犯罪增多、对社会秩序产生威胁等等方面，这些都是造成许多国家苦难多端的原因。与使用静脉注射吸毒的人有关的还有一层危险，那就是传播艾滋病这种传染病的危险非常之高。

大会上届会议以管制药物滥用问题为其一个主题。接着又召开了专门讨论毒品问题的大会第十七届特别会议。会议通过了一项政治宣言和一项全球行动纲领，以期改进并扩大我们目前的扫毒工作。

正如许多需要优先注意的其他方案那样，目前联合国可用于管制药物滥用工作的资源，与问题的幅度相较，简直是微不足道。为使对全球吸毒和毒品贩运产生一点明确的影响，就需要大大增加资金。此外，还需要精简我们目前的体制安排，使之更加有效，这一点目前正在认真考虑之中。

近年来在联合国范围内已起草了一些全面性的法律文书，制订了《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该公约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开始生效。我促请尚未批准这项公约的国家尽快毫无延迟地予以批准，即使还没有批准，也大力执行公约的规定，与此种祸患进行斗争。

近来快速的社会变革带来的消极问题之一，是许多国家境内的犯罪行为，尤其是有组织的和跨国的犯罪行为，骤然增加。今年，联合国在哈瓦那召开了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该届大会通过了一些重要的行动准则、标准和示范协定，旨在加强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反击罪行的工作，并进一步改进刑事司法制度的工作积效。

大会上届会议宣布1990年代为国际法十年，具体表现出全世界越来越认识到需要加强国际关系中的法治观念。这方面的一个显著成就是，经过九年的谈判，大会通过了《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

军国际公约》。该公约把雇佣军的活动定为非法，他们往往受雇在某些国家进行活动，破坏那些国家的稳定局面，并且肆无忌惮地进行抢劫活动。

应付重大祸害的运动只是全球社会战略的一部分。同样重要的是采取建设性的行动来恢复基本的社会体制，并且消除对社会中一些主要阶层的歧视或虐待。

我们面对的问题，其根源是社会基本结构的解体，造成个人没有容身之处可以抵挡社会的狂暴压力和破坏。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发展的推动力，也是对个人的支助力量，因此，大会去年决定将1994年定为国际家庭年。在这方面非常重要是妇女的作用。联合国这一世界组织最近有关妇女的活动包括在《内罗毕前瞻性战略》通过五年之后评价战略的执行情况，并决定于1995年召开一次世界妇女会议。《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通过十年周年，是另一个里程碑；已有103个会员国批准或加入了公约。

然而，我们社会最脆弱的阶层是儿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各国元首的提议，于今年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一次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以期鼓励最高政治阶层支持关于确保儿童生存、保护和福祉的目标和战略，作为社会发展的关键内容。这个会议非常值得注意，因为是东南西北各国领导人的第一次首脑会议，因而有利于世界性的对话。还需要计划作出进一步的努力，以处理今后几十年内对儿童有最严重影响的问题。

去年，大会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达到了一个历史里程碑，因为该公约是第一个界定并诠释儿童在社会上的合法地位的法律文书。国际共同意见的出现，要求加强多边合作集中注视儿童问题，这也许是一个有深远意义的发展。尤其令人鼓舞的是，这个公约在本月初——即通过不到一年的时间——开始生效，对国际条约而言，速度实在是非常快。

然而，人口的激增威胁到、甚至逆转我们在修补社会结构和保护妇女和儿童权利方面取得的进展，令人扼腕叹息。全球人口目前已达53亿，每天增加25万，十年之间几乎增加10亿之多。增加的人口有90%将发生在最贫穷国家。增加的人口要吃、要穿、要住，人

数太多，无法应付。这使发展中国家提供就业、住房、基础设施及有关服务的能力承受太重的负担。除非抑制这一趋势，否则世界许多地区将会发生社会动乱。

经验显示，人口和计划生育方案密切配合其他社会和经济努力，就可有效地带向所期望的成果。自由选择权是极其重要的，而这一权利要靠计划生育、教育和保健机会的增加和妇女地位的提高。

这个领域的努力需要加强。计划于1994年举行的国际人口问题会议将可提供一个迫切需要的机会，在十年中期点审查进展情况。与此同时，联合国这一世界组织须要实施《到2000年全球住房战略》的规定，并处理环境日趋退化的问题，以期为全世界人民提供最基本的需要。

十

四十年前，人们抱着的一种希望是：难民问题只是暂时的，容易处理的。事实上，联合国通过其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所处理的难民问题数量一直未能减少，这一点显现了当今世界上冲突的频繁、持续和严重性。

区域性冲突仍不断地引起大规模移徙。目前波斯湾危机造成的流亡现象是人类生活由于政治动乱而受干扰的最惨痛实例。难民的一些形势长期存在，必须寻找持久的解决办法。国际环境一般而言已变得较不愿接纳难民、寻求庇护者和流离失所的人。

非洲的内争仍不断地造成越来越多的人命损失。国内和外来的流离失所人数不断增加，村镇遭到破坏，战事使社区隔绝，得不到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因而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其结果则是普遍贫困、无家可归和饥荒。

多数情况下，有关国家政府均寻求联合国系统的援助。我曾反复强调，人道主义方案的主要原则在于它的中立性，这种援助必须无歧视地提供给一切有需要的人，不论其所处地点为何。同样重要的是，救济

工作必须得到冲突当事各方的充分支持与合作，联合国救济品的运送队和救济工作人员能够安全地接触到受益对象。

某些地区政治问题的解决立即减轻了压力。例如在纳米比亚，作为该国独立计划的一部分，有几千名纳米比亚人被遣返。南非也有重大进展，使人们产生希望：政治解决将会终止曾使数千南非人到国外避难的那种情势。这对于数字更大的离乡背井，流离失所的莫桑比克人，可能也会带来有利的影响。中美洲尼加拉瓜抵抗力量的成员及家属自愿解散，正在遣送回国，他们回国后的安全受到监测。萨尔瓦多人自愿遣返的数量1989年末和1990年初有所增加。

同上述令人鼓舞的发展相反的是一些原先预期达成的解决未能实现。阿富汗由于困难的政治局面而有三百万以上难民仍然滞留在巴基斯坦，两百万以上滞留在伊朗。柬埔寨的局势也等待着政治协议，成千上万的柬埔寨难民和失所人士目前都还不可能归国。这就表示东南亚的难民状况包括越南和老挝寻求庇护者和难民，仍然是国际社会的严重问题。

南部非洲虽有进展，但非洲难民人数却不断增加。马拉维、索马里、苏丹、乌干达，最近加上科特迪瓦、几内亚和塞拉利昂，都有更多的或新的人潮涌到。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的事件造成两国人民大量流离失所。最大的人潮是逃避内乱的近五十万名利比里亚人。

为了减轻人民痛苦，目前是在困难地理条件、特别是极度缺乏资源和基础设施的情况下提供紧急援助。世界粮食计划署同其他机构合作，在其资源许可范围迅速进行粮食救济工作。

自然灾害也带来大量的死亡、痛苦和流离失所。提供救助是本组织通过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执行的一优先事务。联合国采取了新的方法来减轻其灾难性后果。大会宣布1990年代为国际减少自然灾害十年，体现了一个重要的概念性发展，就是从灾后救济转变为灾前准备。近年来由于当地住房、基础设施的缺陷和重建工作所需其他资源的不足，世界各地发生多次大量的人口损失和无比的经济困难。考虑到最近苏联和墨西哥的地震以及今年伊朗和菲律宾的地震，

很明显地，当代科学技术的进展可以用来尽量减轻地震在脆弱地区造成的破坏。

十一

从以上所述可以清楚看出，过去的一年给本组织带来了新的任务和挑战，其中有些是前所未有的。许多新的倡议现已在望，进入1990年代之际，我们有更大的能力履行交付给本组织的扩大了的任务。但是，职责的增加意味着对行政和财政的新需求。

按照大会第41/213号决议提出的改革方案，秘书处进行了重大的内部结构调整并大幅裁减了工作人员。与此同时，新的程序已增进了会员国和秘书处之间在行政和财政事项上的相互信任。大会上届会议未经决议就通过了各项有关决议，显示出在行政、预算和管理各方面问题上意见更趋一致。同样令人鼓舞的是，1990-1991年订正概算和方案预算获得协商一致通过。

这样，预算过程的改革就完成了第一个周期，而且我相信，实现了大部分的目标。这已促成会员国——以及秘书处内部——更好地了解联合国利用其资源的方式，并鼓励更审慎地使用资源。这也大大减轻了主要缴款国的关切。这是所有会员国和秘书处之间富有成效的合作的结果。

增进本组织效率的一项基本要求是管理人员能取得适切和准确的资料。按我的建议设立一个综合管理资料系统，既有利于分散管理权力，又能集中取得世界各地的资料。这一系统预定于1993年开始作业，将使我们能够最有效率地分析、规划和分配资源。

外地业务非比寻常的扩张，再加上促成和平和维持和平的工作，已使我们的人力和财力资源非常紧张。这一点在规划和筹备阶段以及执行阶段都很明显。及早作出健全的规划对增加成功的机会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于要在很短时限内进行的复杂、多功能行动——在纳米比亚进行的工作就是这方面一个最佳的例子。

不幸，由于本组织的资源全面耗竭，这种彻底的事先筹备已变得越来越难。我认为难以理解的是，许

多联合国会员国不按时、也不全部履行其财政义务，因而危及本组织的财政稳定。今年，到现在为止，只有57个国家政府全额缴纳其对经常预算的分摊会费。目前，会员国积欠本组织经常预算6.6亿美元，因此我们的经费仅能再维持工作24天。并且，会员国未缴的维持和平分摊经费现在共4.36亿美元。

这一暗淡的图景出现在人们对联合国的工作寄予莫大的期望之际。每一天都有新的倡议提交联合国的立法机构；在促成和平或维持和平领域，在人权、保护环境和管制毒品之类领域，以及在通过联合国进行协调至关紧要的许多其他领域。尽管我们力求节约并进行了各项改革，联合国的薄弱财力还是损及人们希望进行的项目。如果各国政府不在适当时限内全部履行其财政义务，本组织将不能发挥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希望它发挥的作用。这个令人沮丧的时刻可能已迫在眉睫。

与这种束手缚足、无能为力的情况恰成对比的是，本组织工作人员，往往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在外地业务和特派团中，表现出令人钦佩的献身精神和技能。同样，在总部的工作人员也堪为楷模地肩负起由于裁减员额和关键人员外派使得人手欠缺而加重了的职责。人们期望联合国工作人员有高标准的工作表现，这就再次指出必须雇用具有最高标准、代表最广泛的地理分布和各种技能的工作人员。不幸的是，联合国提供的薪酬水平已严重落后，在许多领域的报酬已不再具有竞争力。会员国已很清楚这一事实，我敦促它们认真考虑采取补救行动。应当认识到，目前的情况影响到本组织做出成绩的能力，削弱了工作人员的士气，而在本组织正经历迅速变革之时、对其人力资源赋予重责大任之际，工作人员的士气是极其重要的。

十二

过去两年，大众对联合国、联合国的必要性和联合国的工作的看法已有根本的改变。原先，某些方面人士把联合国看做是一座喧哗的“巴别通天塔”，充其量不过是往往没有结果的外交会谈的场所，现在却认为联合国是达成协议和作出决定的中心机构，是阻挡国

际关系中产生混乱的屏障，是最能确保各国的行动遵守国际法和符合正义要求的一个机构。

我相信这种看法对会员国政府的政策有重大影响。它们可以从一种情况中汲取力量，那就是所有国家境内拥护和平的人数与日俱增——而且非政府组织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这些人所关切的问题，尤其是裁军、人权、环境等领域的问题。但是，各国政府要做到这一点，要想在困难的情况下调整本身的态度和政策，以符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就必须把本组织视为一个特别援助的来源，能协助它们解决涉及其他国家的问题、解决国际争端、应付全球社会面临的新挑战。必须把《宪章》看做不是一件外在的、累赘的附属物，而是每个国家的生活必须遵守的一套原则。

联合国与任何会员国之间既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种敌对的关系。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只有联合国所制订和使用的多边主义程序能够为当事各方及其支持者伸张正义，使它们能体面地脱离接触。

国际事务的进化如果有所昭示，那就是：无论在目前情况下，或在任何可预见的情况下，都不容许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毫无限制自由玩弄手段，或有政治力量把自己的价值观念或世界观强加于人。然而，这丝毫不减损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凭借本身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固有能力和能力，带头拟订全球行动纲领，而在联合国取得备受尊重的地位。一个不断改变、动荡未定的世界不能忍受全球或区域的霸权，但可以接受影响，尤其是本着政治家风度、始终依据国际法而产生的影响。权力越大，越有责任主动地和客观地按正义行事。对国家来说是如此，对整个联合国及其机构来说也是如此。

我认为，近年来一项良好的发展是，国际会谈已经抛弃意识形态方面或辩论技巧方面过分沉重的包袱。发生争论的利益或主张，如果老老实实在地提出来，比较容易排解；要协调两种针锋相对的主义就困难得多。这种讲求实际的新风气使我们摆脱了冷战的枷锁，如果要使这种新风气普及全球，各国就必须摒除旧时残留下来的成见，本着理智和绝对的正义来进行对话。不能把国际道义与道学姿态混淆；道学姿态可能掩盖真实的情况。法统的概念有时难免发生冲

突，因此，要使问题不致一发不可收拾，唯一的办法是诉诸《宪章》所载并为所有国家接受的原则。

世界争取稳定和幸福的奋斗已达到了一个定形的阶段。稳定并不意味着停滞。和平并不会使一切冲突停止。和平只是不用武力或恫吓为手段，而用其他方法使冲突可以控制。引用联合国一位精神上的先驱伊曼

纽尔·康德的话来说，和平的意义是“最热烈竞争下的均衡状态”。联合国就是要把我们的视线引向这一目标。

秘 书 长



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